

【语言·文学】

社科术语翻译的适选机制研究

——以严复的翻译实践为例

陶李春¹, 朱希伟²

(1.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南京传媒学院 思政与基础教学部, 江苏 南京 211172)

摘 要:面对丰富的术语翻译实践,译者在术语翻译过程中需要考量诸多因素,关注术语翻译的整个过程,并完成适应选择。鉴于此,有必要从社科术语翻译这一领域出发,探索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结合严复的翻译实践,挖掘相关历史文化背景资料,在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归纳社科术语翻译的适选机制。

关键词:术语翻译;适应与选择;适选机制;严复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章编号:**1673-5420(2020)05-0080-10

引 言

术语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虽然一直以来没有被学界给予足够重视,但其本身的研究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巨大。在信息技术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术语管理、术语翻译和术语识别与提取等议题逐渐引起大家的重视,而术语学本体论问题自然也需要学界更多关注。术语研究一直被归纳在应用语言学领域^[1],随着外来文献的引入和术语翻译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用的不断增强,对术语翻译的研究亟待深入。“术语的跨语际传播,自古有之且伴随着人类语言文化交流的始终”,其研究意义重大,“价值不仅仅在于其学术价值本身,而且也在于其文化意义方面”^[2]。需要指出的是,术语翻译作为一种特殊门类的翻译,需要“在不同语言间形成表示同一概念的等价术语”^{[3]9},它兼具翻

收稿日期:2020-07-02 本刊网址:<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陶李春,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术语翻译。

朱希伟,助教,硕士,研究方向:翻译学。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术语库的严复译名研究”(19YYB0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严复社科术语翻译的适应选择机制研究”(20YJC740056)

译的普遍性和自身的特殊性,而翻译适应选择论对术语翻译的过程机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也有其局限性。换言之,术语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重要类别,在遵循翻译研究学理性的同时,也有其本身的特点,即术语翻译的复杂性。理解、挖掘和阐述术语翻译的复杂性是现今研究的一个难题。

翻译适应选择论能解释众多翻译现象,解答一些翻译问题,但对术语翻译却有些力不从心。细究起来,这与术语翻译的复杂性分不开。这种复杂性涵盖多个方面,即术语翻译实践的特殊性,术语翻译在系统选择、过程选择及语境选择等环节的复杂性等。因此,在术语翻译研究领域,仍旧存在着理论不够系统,指导思想不够完善的问题。探寻社科术语翻译的适应选择机制,可以从近代翻译家严复(1854—1921)的翻译实践入手。

严复译著作为晚清民初时期西学东渐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能够为今天的社科术语翻译研究提供丰富的历史素材。张德让指出,《原富》等译文是文章学翻译研究的宝贵语料,对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也有反向的借鉴价值^[4]。鉴于此,本文通过统计分析严复译著中的人文社科术语译名,尝试从适应选择论的视角对社科术语翻译的适应选择机制进行分析。

一、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社科术语翻译

社科术语翻译与适应选择论结合有一定的理论渊源。适应选择学说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本思想之一。近年来,生态意识的普及为学术界打开了新思路,一些专家学者试图用进化论中适应选择的原理来解读翻译现象和过程。胡庚申提出了三个假设:第一,如果达尔文的“适应/生存”学说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而且同样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基本思想和原理就能指导翻译理论研究;第二,如果可以运用“适应/生存”学说和“自然选择”原理来描述翻译过程,则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应该能够成立;第三,如果上述假设成立,“翻译适应选择论”便会对翻译现象和翻译活动具有解释力和可操作性^{[5]11-12}。这三个假设相辅相成、互相联动,构成了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有机整体。

而随着生态翻译学和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亦有学者将这种思想引入术语翻译的研究。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术语翻译系统构成复杂。社科术语翻译属于术语翻译的一个分支,在利用翻译适应选择论对其进行研究时,可以得到一些新成果。然而,这一研究方法并不具有普适性,在研究过程中,还是要结合具体社科术语翻译实践进行分析,并在运用这一视角解释翻译活动的同时,探索其局限性和发展空间。

间。在翻译适应选择论中强调以“译者为中心”,术语译者是术语翻译过程的主导,在源语生态环境和目标语生态环境之间进行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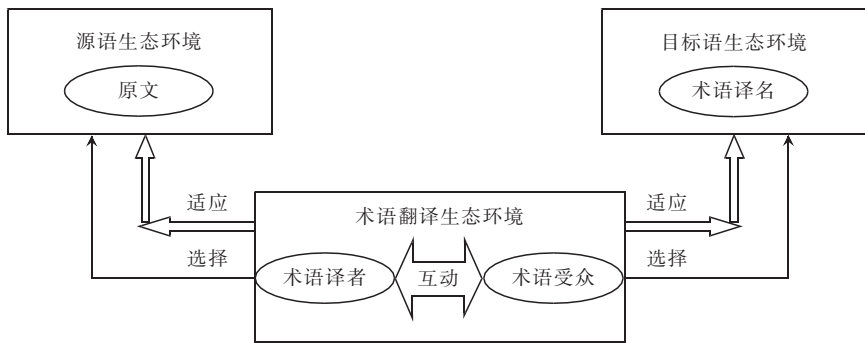


图 1 术语译者的选择适应过程与机制

本研究基于上述过程与机制,对严复社科术语的翻译过程及其译名进行总体考察和个案分析,从而对社科术语翻译的适应选择机制做出有益探索,为社科术语翻译、术语规范化使用、译名审定提供参照。

二、适应选择论视角下的严复社科术语翻译过程探索

(一)译著时间轴线分析

“一般来说,语言并不因某一事件而发生剧变,但这一事件往往会给语言变化带来一定的契机。”^[6]严复生于 1854 年,正值反封建反侵略的太平天国运动方兴未艾之际。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和甲午战争的惨败,导致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内外交困,唯有变法图存,因而士大夫这一阶层,即文人和官员群体,是严复译著的主要受众。

我们根据严复的八部主要译著的发表时间来探索严复社科术语翻译的过程。1896—1909 年是严复创作的巅峰时期,仅在 1903 年他就发表了《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论》和《穆勒名学》四部影响力深远的译作。这个时间段也是严复人生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将严复的个人经历、创作历程和当时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统一在一起来看,可以发现,这八部译著主要发表于戊戌变法时期和辛亥革命前夕,其间我们国家还遭受了八国联军铁骑的践踏和蹂躏。

严复的翻译创作进程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不断向前的。在戊戌变法前后,严复以一部当头棒喝般的《天演论》敲响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警钟,为维新变法提供

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变法失败后,严复笔耕不辍,不断引进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宣传科学民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严复这八部译著的风行也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文化基础。

(二)翻译过程剖析

作为译者,严复是整个翻译过程的主导,需要做出一定的选择以使其术语译名适应源语生态环境和目标语生态环境。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与受众互动并受到翻译生态环境中各个要素的影响。

在对源语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上,严复的选择主要体现在译前选材方面。严复选择的八部著作,均带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涉及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哲学等学科,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在对目标语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上,严复的选择主要体现在对译文整体风格的把握上。针对近代社会的士大夫阶层,严复并没有采用白话写作,而是在修辞手法、从句方式等方面刻意模仿桐城派,参考经史子集的遣词造句和谋篇布局,力求古雅。在当时的宏观语言环境下,严复的译文一次次引起轰动,以《天演论》最为突出,其翻译的“天演”“天择”“物竞”“淘汰”等术语时常见诸报端。

三、严复社科术语翻译的适应选择机制

(一)译者适应选择

尤金·奈达提出,“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要做出成千上万次的涉及选择与处理的决定,以适应另一种文化,适应另一种语言,最后还要适应读者群”^[7]。译者作为跨文化交际桥梁的搭建者,承担着术语翻译生态系统中生产者的职责,要充分认识到社科术语翻译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从而妥善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

选材是译者最先要考虑的事项。维新派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曾撰写《变法通议》宣传改良思想,其中便有专门一篇为《论译书》。他在文中写道,“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共译之例;三曰:善能译之才”^[8]。所谓“择当译之本”指的就是翻译的选材问题。以严复翻译《天演论》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为例:《天演论》发表时正值清朝晚期,恰是民族危亡之际。他选择 Henry Huxley 的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现亦译作《进化论与伦理学》)来翻译,阐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进而推演到人类社会,在当时可谓是振聋发聩,起到了启迪民智的效果。严复在《天演论》的翻译过程中还采取了编译的策略,也是应对时代之需的明智之举^[9]。

在《论世变之亟》中,严复坦言了在交际方面遇到的障碍:“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10]²当时的国人才刚开始被迫“睁眼看世界”,即便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士大夫阶层,也未必能很快接受西学的思想。加上不少保守的旧儒和官员更倾向于当时被视为正统的孔教,对西学或多或少怀着抵触甚至不屑的心理。因此,要想让这一群体撇开成见,以一种更为自然的方式接受文本所传递的信息,就要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一定的“本土化”处理。“严复翻译话语在单音词的使用、词类的活用、语气词、句子的词组化现象、判断句的无系词结构、排偶句等方面都继承了先秦词法句法的特点,摒弃了先秦汉语的极个别不合时宜的落后方面,因而严复译文呈现出先秦文言的气象。”^[11]严复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的先秦古籍为典范,用时人喜闻乐见的文言文方式对原文本进行了再创作。

(二)译名适应选择

严复推行“物竞天择”的天演思想,影响和启发了许多有识之士,其中就包括鲁迅。鲁迅在日本留学后期写的很多文章,颇受进化论思想的启发。然而,他作品中的词汇多半源于和制汉字,却鲜有严复术语译名的踪迹。

众所周知,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尽量避免使用“天演”这样的字眼,而用“进化”二字代替,有其自身的考量。一方面,旨在鼓励人的觉醒与斗争意识,强调“人为”,而不是“天演”。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打击“尊孔复古”的逆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因此,相对于古雅深奥的严复译名,鲁迅宁用浅白新颖的和制汉字去推行新兴思想和进步观念。即便是“进化”一词,在五四运动后,也“逐渐为‘创造’‘革命’等字眼所替代,更突出了新旧、古今之间的隔绝与对立”^[12]。种种因素作用之下,严复的许多术语译名自那时起便已开始淡出读者的视野。

从鲁迅对术语译名选择的重心偏移,可以管窥严复社科术语译名在语言环境变迁下适应选择的历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严复译著价值的否定,同一时期的“胡适与蔡元培都是支持白话运动的主将,但他们却能以同情的态度,了解古文对当时学者的意义,因而肯定严译的贡献”^[13]。

严氏术语译名特色鲜明,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固然有其卓越成功的一面,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环境的动态变化,原本值得称道之处却又成了制约其发展传播的桎梏。因此,分析社科术语翻译的适应选择过程要结合语境从多个角度展开,客观地、全面地去评价和审视。

(三)译者、受众与翻译生态环境的有机统一

译者、受众和翻译生态环境三者的关系可以用图2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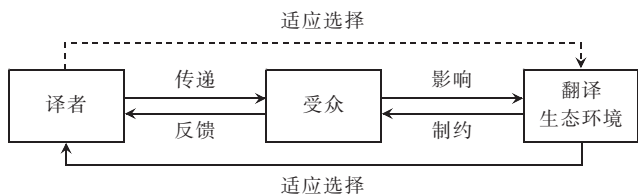


图2 译者、受众和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示意图

首先,译者和受众、受众和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译者向受众传递信息,受众向译者反馈信息;受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翻译生态环境,同时翻译生态环境又制约着这一群体。

具体而言,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具有一定的作用力。一方面,译者本身处于翻译生态环境系统中,需要调整翻译策略来进行适应性选择,或选择性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另一方面,翻译生态环境系统中的语言、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又制约着译者所面向的读者,而读者反馈给译者的信息往往成为译者调整其翻译策略的主要依据。因此,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具有双重作用力。

其次,翻译生态环境和译者之间的作用力是双向的。译者需要面向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适应选择,同样,翻译生态环境面对译者也要进行一定的适应选择。

译者并非直接作用于翻译生态环境,而是先对受众进行信息传递。随着读者范围的扩大和受众对信息接受程度的加深,译者及其译著对受众的影响就会不断强化,而当受众扩大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会引发翻译生态环境中某些因素的改变,此时,环境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从而满足译者和受众的需要。然而,这一作用是相对间接的、潜移默化的。

以严复翻译过程为例:严复作为译者,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为主要受众,近代中国的语言、交际、文化、社会等各个要素构成的系统为翻译生态环境。严复试图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灌输给士人阶层,于是选择翻译西方学术典籍;考虑到士人阶层的思想状态和审美观念,于是严复选择了文言文夹叙夹议的翻译手法。当时的宏观语境、社会背景等制约着读者的思想,而一旦读者的思想发生转变,又势必会引起整个环境的变化。严复在进行选择以适应当时翻译生态环境的同时,宣传了西学先进思想,激励了大批有识之士,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发生。从这一角度上讲,社会发展的大致趋势符合严复翻译西学著述的初衷,这同样也可被视为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适应选择。

四、适应选择论视角下的严复社科术语译名研究

严复的译著虽然在当时反响巨大,但是其许多社科术语译名并没有留存下来,而是在与

和制汉语译名的竞赛中被淘汰了。尽管适应选择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严复的部分译名还是颇有分量,值得赞誉和肯定的。他在钻研术语翻译方面苦心经营的治学方法,兢兢业业的治学态度,以及虚心虔敬的治学精神,也是值得当今术语翻译研究者思索与学习的。

(一)译名个案赏析

严复译名之严谨,一字一句皆细究其义,力求用词贴切。如《天演论》题目中,一个“天”字就可谓微言大义。严复自言,“以神理言之上帝,以形下言之苍昊,至于无所为作而又因果之形气,虽有因果而不可言之适偶,西文各有异字,而中国常语,皆谓之天”^{[10][11]},只“天”一字便将西语中难以言说的玄妙道尽。“对‘天’字,严复剖析甚精,划分出三意。但‘天’字不论用何意,都能同时使人感到另外两意。因此‘天演’虽用第三意,却仍可使人感到第一、二意。”^[14]

又如《群学肄言》中表示“群”与“己”的一对概念 total (aggregate) 和 unit,严复将其分别音译成“拓都”和“么匿”。“源语语言和目的语语言的可分解性、造词者的分解能力等都将给新词的带来影响。意译要求译者对源词的意义用法要透彻理解,融会贯通,然后在目的语中找出一个词汇,能最大程度保持意义上的近似。”^{[15][14]}对于不熟悉源语言英语及对应原词的人来说,音译术语译名难以从字面上去理解,远不如“社会”和“个体”、“团体”和“单位”这样的释义容易令人接受。这样的术语译名往往难以适应目标语生态环境,存活率和生命力较低。

(二)严复社科术语译名封存之殇及成因

严复社科术语译名没有沿用下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很好地适应目标语生态环境,过于求雅,受众狭窄,缺乏互动,不利传播。“严复这种追求译文语言本身的古雅是不可取的。‘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这也是后世对严复有争论之处。”^[16]

“明治维新以后,日语率先完成了向近代国语的转变,开始与西方文明连在一起,成为传递近代新知识的载体。”^[17]国学大家王国维认为和制汉语译名比国人所创的译名更准确,且符合汉语双音节词的发展方向。例如,Evolution 严译“天演”,日译“进化”;Sympathy 严译“善相感”,日译“同情”。的确,严复的单字译名较日译更为复杂难解,而且单音词在读音上没有复合词那么朗朗上口,在传播方面竞争力略低。严复在对术语翻译生态环境做出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时选用的翻译策略难以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五、社科术语翻译机制探索及相关因素分析

严复的社科术语翻译实践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作为翻译过程中心的译

者严复,在19世纪末,“不仅深深地沉浸在中国文化中,而且沉浸在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特殊局面中。他的关注点是他那一代人的特别关注点。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与这样的局面和译者本人的翻译密不可分”^{[18]4}。在对源语生态环境和目标语言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方面,严复综合考虑了社会环境、读者群体等诸多因素,在翻译题材、翻译风格、翻译策略等方面都作出了适应选择,从这一点来说,严复的翻译有其成功之处。然而,译者所在时代的背景和历史环境等又制约了其适应选择策略,使其不能完全适应语言环境变化发展要求。在此基础上归纳社科术语翻译适应选择机制,需要考虑的因素有:术语翻译标准,译者、受众与翻译生态环境三者的关系,翻译过程中的具体细节。

要归纳相对成熟的社科术语翻译的适应选择机制,不仅需要分析术语翻译的过程,还需要参考术语翻译的标准,才能对翻译结果进行正确的评估。鉴于译名确立过程中所涉及的领域庞杂,术语的评价标准应该具有多样性。姜望琪和侯国金的论辩,集中阐述了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立场。在《论术语翻译的标准》一文中,姜望琪提出准确性、可读性、透明性等几条评判标准,并“主张宁准而不可读”^[19]。而侯国金先生并不同意“准确性第一位”的要求,质疑“透明性”的可行性,并提出“系统-可辨性原则”。他表示,假如要按轻重缓急来排序“从他、从众、从己”,应该是“从众>从他>从己”,以尽量维护术语翻译的规范性^[20]。

实际上,在术语翻译标准方面,姜望琪和侯国金二位的论辩是“彼此互补而非相互冲突”的,由于“术语及其翻译的本质属性不可能是单一,而是复合的”,二人的观点其实“分别强调了术语本质属性的不同方面”^[21]。以严复八部译著中所涉及的人文社科术语为例,其主要属性有六种,即“单义性”“系统性”“简明性”“理据性”“稳定性”和“能产性”^[22]。考虑到这一特殊类别属性,对最终翻译结果的评判亦应从多角度出发,将“局部微观评价和总体客观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23]。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还应注意到: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具有双重作用力,翻译生态环境和译者之间的作用力是双向的——前者作用于后者较为直接,后者作用于前者则相对间接。译者和受众、受众和翻译生态环境这两对对象相互作用,且译者和受众最终统一于整个翻译生态系统中,实现了互联互动。

在严复翻译适应选择的过程中,影响因素有:原文的内容体裁风格;源语语言环境;受众——首先是第一批读者即赞助者、提出建议的友人等,其次是士大夫阶层,最后是大众。而起主导决定作用还是译者本身,包括译者个人生平经历,翻译作品前期译者所做的准备,翻译作品时期译者的生活状态、生活环境及整个社会环境,翻译过程中所做的策略调整,翻译作品后译者的自我评价与改进,译者所处环境的动态变迁,等等。

结 语

对于译本的解读需要着眼全局,“不局限于语言分析,还要具体考证原文、原文文化、原文的社会、译者、译语文化和译语的社会等等”,总之“要适应译者和译本所处的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24]。如今的适应选择理论尚有许多空白待填补,我们在研究时应积极思考,把术语译者和受众代入翻译生态环境,辩证统一地分析各种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

参考文献:

- [1] KOCOUREK R. The preliminary requirements of a suitable linguistic terminology theory: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pplied Linguistics[C]. Quebec: Laval University Press, 1981.
- [2] 魏向清,张柏然. 学术摹因的跨语际复制: 试论术语翻译的文化特征及研究意义[J]. 中国外语, 2008(6): 84-88+94.
- [3] 冯志伟. 现代术语学引论[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7.
- [4] 张德让. 严复《原富》翻译的文章学研究[J]. 上海翻译, 2019(1): 6-10.
- [5]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6] 陈力卫. 近代辞典的尴尬: 如何应对洪水般的日语新词[J]. 东北亚外语研究, 2014(2): 2-9.
- [7] NIDA E. A fresh look at translation[G] // BEERY A, ENSINGER D, PRESAS M, ed.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ranslation. Barcelona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3-12.
- [8] 梁启超. 论译书[G] //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 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8-20.
- [9] 王家根,陶李春. 传播学视角下的严复编译研究: 以赫胥黎的《天演论》为例[J]. 中国科技翻译, 2019(4): 12-15.
- [10] 王栻. 严复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1] 韩江洪. 严复翻译与先秦汉语[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7(6): 111-115.
- [12] 惠萍. “天演”的进化: 基于传播学视角的严复思想再考察[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5): 108-117.
- [13] 黄克武. 严复的翻译: 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J]. 东南学术, 1998(4): 3-5.
- [14] 王克非. 《严复集》译名札记[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7(3): 51-53.
- [15] 沈国威. 严复与科学[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7.
- [16] 霍光利. 评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J]. 燕山大学学报, 2002(S1): 116-118.

- [17] 沈国威. 西方新概念的容受与造新字为译词:以日本兰学家与来华传教士为例[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1):121-134.
- [18] SCHWARTZ B.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 [19] 姜望琪. 论术语翻译的标准[J]. 上海翻译(翻译学词典与翻译理论专辑), 2005(S1):80-84.
- [20] 侯国金. 语言学术语翻译的原则和“三从四得”:应姜望琪之“答”[J]. 外国语文, 2011(3):94-99.
- [21] 胡叶, 魏向清. 语言学术语翻译标准新探:兼谈术语翻译的系统经济律[J]. 中国翻译, 2014(4):16-20.
- [22] 魏向清. 人文社科术语翻译中的术语属性[J]. 外语学刊, 2010(6):165-167.
- [23] 吴义诚. 翻译研究的几个问题[J]. 中国翻译, 1997(2):2-6.
- [24] 焦卫红. 严复译著《天演论》的生态翻译学解读[J]. 上海翻译, 2010(4):6-10.

(责任编辑:楼启炜)

On the mechanism for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in social science term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ed terms by Yan Fu

TAO Lichun¹, ZHU Xiwei²

- | | |
|--|---|
|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 2.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Political and Basic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Nanjing, Nanjing 211172, China |
|--|---|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study on term translation for now has yet to keep pace with its rich practice. Many factors are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term translation process as a translator adapts and selects. To further explore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se the particularity and complexity of term translation by case studies of translated terms by Yan Fu and to draw a mechanism for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in term translation, wit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aken into full consideration.

Key words: term translation;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mechanism for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Yan Fu